

1967

18卷

名誉主编
主编
副主编

李德生 吴阶平 经叔平 季羨林 张文彬
许嘉璐 路甬祥 任继愈 戴逸 袁贵仁
刘述礼 张承钧 李永田 邓星盈 魏丕植

中華人民共和國日史



四川人民出版社

18

谨以此书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四周年华诞

1967



中華人民共和國日史

啓功



名誉主编 李德生 吴阶平 经叔平 季羨林 张文彬
主编 许嘉璐 路甬祥 任继愈 戴逸 袁贵仁
副主编 刘述礼 张承钧 李永田 邓星盈 魏丕植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196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日史》编委会编.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8
ISBN 7-220-06468-3

I. 中… II. 中… III. 中国-现代史-1967
IV. K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64758 号

ZHONGHUARENMINGONGHEGUO RISHI

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1967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编委会 编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技术设计
责任校对

叶 勇
周靖明
杨 潮 古 蓉
伍登富

出版发行
网 址

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盐道街3号)
<http://www.bookssss.com>
E-mail: scrmcbsf @ mail.sc.cninfo.net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86679239

照 排

成都华宇电子制印有限公司

印 刷

四川智元科贸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9

插 页

5

字 数

271 千

版 次

2003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0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书 号

ISBN 7-220-06468-3/K·927

定 价

9998.00 元(共 50 卷)

■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概 述

本年，“文化大革命”进入“夺权”阶段。由上海“一月风暴”引发的“夺权”行动遍及全国各地。许多地区发生大规模武斗，大量工矿企业陷入瘫痪状态。全国陷于大动乱局面。

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社论提出：“1967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消除它的影响的一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

1月4日，陈伯达、康生、江青在北京接见造反派时称：陶铸到北京来，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坚决执行者。由此，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中央宣传部长陶铸被作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突然被打倒。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也被打倒。1月5日，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被揪斗。1月11日，经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军委改组全军文革小组，撤销刘志坚的组长职务，成立新的全军文革小组，由徐向前任组长，江青任顾问。

1月上旬，上海发生所谓“一月风暴”。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指挥下，以“工总司”为首的上海造反派夺了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权，2月5日，正式成立“上海人民公社”（不久改名“上海市革命委员

会”）。这一行动得到毛泽东的赞扬和批准。《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先后发表评论员文章和社论，肯定和支持上海的夺权，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自下而上地夺权”。一个月之内，山西、山东、贵州、黑龙江等省造反派先后夺了当地党政大权，并得到中央的肯定。3月30日，《红旗》杂志第5期发表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引用毛泽东的话：

“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此后，夺权之风刮遍全国，打、砸、抢、抄、抓和武斗事件普遍发生，动乱局面愈演愈烈。

1月上、中旬，在江青等人的授意下，造反派冲击了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住处，分别揪斗、围攻了他们。

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该文件明确规定：对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地富反坏右分子，要坚决镇压。

“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公安六条》颁布后，不少干部和群众，因喊错口号，写错字，或受人诬陷，以反对毛泽东，反对林彪、江青、康生，“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遭到批斗，甚至关进监狱。

鉴于全国局势日益混乱，解放军奉命执行“三支两军”工作。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决定》规定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简称“支左”），并确定了解放军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五条原则。从此，解放军开始全面执行“三支两军”工作。

为了稳定军队，1月28日，中央军委颁布《八条命令》，规定：军队必须坚决支持地方左派；不准冲击军事机关；军以上机关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以下及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则不进行等。2月，中

中央军委作出《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意见》，对《八条命令》的原则作出进一步的明确规定。上述两个文件的颁布，保持了部队在“文化大革命”混乱局面中的相对稳定。

“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引起了不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强烈不满。2月11日和16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政治局碰头会（即“怀仁堂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委员和军委领导人，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该将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同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提出了强烈的批评。此事后来被称为“大闹怀仁堂”，也被诬指为“二月逆流”。毛泽东在看了江青、张春桥等人关于此事的汇报之后，于2月18日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严厉批评了在怀仁堂会议上提意见的这些老同志，指责他们是搞复辟，搞翻案。2月25日至3月18日，在怀仁堂召开了7次“政治生活会”，批判这些老同志。随后，林彪、江青等人借机掀起所谓“反击全国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的浪潮，更大规模地打击迫害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此后，中央政治局实际上停止了活动，其职能被中央文革小组取代。

3月16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1人的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及其附件。该文件把1936年薄一波等人执行党组织决定出狱定为“自首叛变”，造成了一起轰动全国的重大错案。此后，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的煽动下，全国到处刮起“揪叛徒”之风。群众组织任意推倒组织上对在白区工作过的、被捕过的干部作出的正确结论，重新审查，甚至刑讯逼供。这些干部被罗织罪名，遭受残酷迫害，许多人受到长期监禁。一批老革命家因长期遭受非人折磨，含恨去世。

4月1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发表的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该文在一系列问题上混淆是非，诬蔑刘少奇“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而是“假革命”、“反革命”，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随后，北

京各重要报刊先后发表文章，批判“中国的赫鲁晓夫”、“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刘少奇的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自此，全国掀起批判刘少奇的高潮。6月3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成立。刘少奇、王光美被造反派揪斗，并被抄家。

武汉发生“七二〇事件”。“百万雄师”是武汉的一个群众组织，拥护武汉军区，保护许多干部，因而受到武汉军区的支持，在极短时间内发展到百万人左右。7月20日，“百万雄师”不满谢富治、王力将其打成“保守组织”，将王力拉到武汉军区大院进行说理斗争。此事被诬蔑为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搞的“兵变”，是“反革命事件”。7月26日，经毛泽东、中共中央批准，武汉军区发表《公告》。《公告》说，“七二〇事件”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叛变行动，“王任重和陈再道则是上述事件的罪魁祸首”。在此前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多篇社论，支持武汉造反派。“百万雄师”的群众遭到残酷迫害。湖北全省在“七二〇事件”后被打伤、打残、打死者多达18.4万余人。

7月22日，江青在对河南群众组织代表团讲话时说：“我记得好像就是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次日，“文攻武卫”口号在《文汇报》公开发表。此后，全国武斗急剧升级，各地不断发生抢夺部队枪支武器，开枪打死打伤群众的恶性事件。

7月25日，康生等人在新华社电讯稿中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8月1日，《红旗》杂志第12期发表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文章提出：“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出来。”北京一些大专院校的造反派窜到南京等地，串连当地造反派，揪“军内一小撮”，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枪支弹药，制造事端。

“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遭到毛泽东的否定。8月11~12日，中央文革小组召集北京大专院校和中学各群众组织开会，根据毛泽东指示着重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派要相信和依靠中国人民解放军，“揪军内一小

撮”的提法是完全错误的。8月20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可靠支柱》。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布《关于开展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布《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这些文件,保证了军队的相对稳定,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造反派组织对部队的冲击和破坏。经毛泽东批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于8月底被隔离审查。9月下旬,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中央军委办事组。组长杨成武,副组长吴法宪。

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公开点名批判陶铸和王任重。文章诬蔑陶铸是“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叛徒”、“漏网的大右派”、“修正主义者”、“混进来的反革命两面派”,诬蔑他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和《思想·感情·文采》两本书宣扬“资产阶级反革命派的‘理想’”、“叛徒加奴才的‘精神生活’”、“对无产阶级刻骨仇恨的‘感情’”。毛泽东在审查姚文元文章时加了一段话,第一次公开在报刊上提出要在全中国彻底揭露“‘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

7~9月,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沿途发表一系列谈话。他说:“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好。”“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各地革命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专政是群众的专政。”“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要斗私批修,要拥军爱民,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11月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经毛泽东审阅的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理前进——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50周年》。首次正式确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把这一理论归纳为六个“要点”。其核心是:在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并且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还要进

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就是这种“继续革命”的最重要的方式。

北京发生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8月22日，北京红卫兵和群众1万余人在英国驻华代办处举行声讨大会，声讨港英当局制造事端和勒令香港三家爱国报纸停刊。会后，狂热的造反派和红卫兵包围了英国代办处，并放火烧毁了代办处，造成极恶劣的国际影响。事后，周恩来向英方赔礼道歉，并指示为英国代办处重新修建了房屋。

6月17日，我国在西部地区上空成功爆炸第一颗氢弹。

7月1日，成昆铁路建成通车。铁路全长1085.8公里，是三线建设的核心工程。

9月5日，中国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赞比亚共和国政府关于修建坦赞铁路的协定在北京签订。确定中国援助坦桑尼亚和赞比亚数亿元以修建坦赞铁路。该铁路于1976年7月正式建成通车。

本年张春桥、王洪文一手制造了“上海地下党”冤案。上海解放前，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已建立了500多个支部，共8000多名党员，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上海各级党组织的骨干，有不少人到中央和军队担任了领导职务。1967年，张春桥等多次诬陷上海地下党是“国民党”、“潜伏特务”、“叛徒集团”。他们对原上海地下党建立了39个中心专案组和845个卫星专案组，原上海地下党员被立案审查的达3600人。

“文化大革命”前担任区、县、局以上领导职务的99名原上海地下党员全部靠边站，其中有65名被拘留或隔离审查，有4人被迫害致死。

本年，全国全面陷入混乱局面，工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生产持续下降。文化、艺术、教育、科技、体育等事业也受到严重摧残，与外国的各方面交流全面断绝。

本年国民经济主要指标完成情况，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工农业总产值2104.5亿元，比上年下降9.6%。其中，工业总产值1453.5亿元，比上年下降13.8%；农业总产值651亿元，比上年增长1.6%。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粮食，2.17亿吨，比上年增加382万吨；棉花235.4万吨，比上年增加1.7万吨；钢，1029万吨，比上年减少503万

吨；原煤，2.06 亿吨，比上年减少 4600 万吨；原油，1388 万吨，比上年减少 67 万吨；天然气，14.6 亿立方米，比上年增加 1.2 亿立方米；发电量，774 亿千瓦时，比上年减少 51 亿千瓦时。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770.5 亿元，比上年增加 37.7 亿元。进出口总额 112.2 亿元，比上年减少 14.9 亿元。基本建设投资总额 140.17 亿元，比上年减少 69.25 亿元。国家财政总收入 419.4 亿元，总支出 441.9 亿元，赤字 22.5 亿元。

1 月

1月1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篇社论由毛泽东审定。社论说，十月革命解决了用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则解决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给全世界无产阶级树立了新的伟大的榜样。社论回顾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情况说，有一两个或几个在中央做工作的负责人，乘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机会，抛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社论还说，文化大革命出现了新局面，这个新局面的主要特点就是，广大工人、农民起来了。他们冲破各种阻力，建立自己的革命组织，投入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社论提出：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一年。1967年，提到全党和全国革命群众面前的政治任务，主要是：第一，在工厂和农村中，要根据毛主席和党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大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推动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第二，对于学校里和文化领域各界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大力提倡革命师生、革命知识分子，有计划、有组织地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实行和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第三，充分发扬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第四，继续开展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性的批判。

当日 首都 30 多所高等院校集合数十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声讨”刘少奇、邓小平的游行集会，大会宣读了《告全市人民书》和刘少奇的 20 大“罪状”。

当日 《红旗》杂志发表姚文元长达 3 万字的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文章揭示了周扬在建国后 17 年文艺界的所谓四次“重大斗争”中的四大“罪状”：“反对和咒骂毛泽东思想”；“为一切牛鬼蛇神翻案”；“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大力推销现代修正主义的黑货”。文章最后以毛泽东的话作结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触动到人们根本的政治立场，触动到人们世界观的最深处，触动到每个人走过的道路和将要走的道路，触动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它将锻炼出整整一代共产主义者。”

当日 “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劳动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联合通知》，作出以下紧急决定：一、为了保证‘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等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加生产的权利，一律不得解雇。二、1966 年 6 月 1 日以来解雇的‘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等，必须立即召回本单位，参加运动，参加生产，补发解雇期间的工资。三、凡遭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等，必须当众恢复名誉，赔偿损失，妥善安排，认真处理。这三条决定基本就是江青 1966 年 12 月 26 日接见“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代表时口授的三条。

当日 被荷兰政府长期无理阻挠回国的我国出席国际焊接学会第 19 届年会的中国焊接学会代表团，经过 5 个多月的斗争之后，在团长潘任宪率领下返抵北京。他们在机场受到了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兼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副理事长沈鸿、外交部副部长罗贵波、中国前驻荷兰代办李恩求以及有关机关代表和代表团成员的在京家属的热烈欢迎和慰问。

当日 中共中央决定将天津市改为直辖市。由解学恭任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阎达开任第二书记。

1月2日 《人民日报》转载《解放军报》社论《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使我军真正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社论说，毛主席的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的指示，进一步地提出了建设无产阶级的人民军队的宏伟纲领，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和战略意义，是我军建设永恒的指针。社论提出1967年全军工作总的方针是：坚决贯彻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突出政治，积极参加和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进一步加强人的思想革命化，创造更多更好的四好连队，使我军真正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第一，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得更好，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提高到新阶段。这是全年工作的根本。第二，继续狠抓基层建设，创造更多更好的四好连队。第三，在执行战斗队任务的同时，当好工作队、生产队，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第四，加强组织革命化，把真正优秀的指战员大胆提拔到关键性的负责岗位上。第五，提高警惕，坚守战斗岗位，加强战备工作。

当日 周恩来、朱德、萧华、杨成武等领导人接见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军队歌舞团领队阿波斯托尔·埃米尔上校、团长迪努·斯太利安上校以及歌舞团部分成员，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接见时在座的，有徐立清、张奚若、乔冠华等。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伊斯特拉代、武官索列斯库上校也在座。晚上观看了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军队歌舞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演出。

1月3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报纸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省市报纸，可以停刊闹革命；但是，不应停止代印《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的航空版。

当日 对外友协和中缅友协举行招待会，庆祝缅甸联邦独立19周年及中缅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签订7周年。对外友协会长楚图南和缅甸驻中国大使沙马杜瓦·信瓦瑙在招待会上讲话。

1月4日 陈伯达、康生、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时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总理、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宣部部长陶铸，“到中央以来，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他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但对文化大革命的许多问题，从来没有跟我们商量过，他独断专行，不但背着中央文革，而且背着中央”，并说陶铸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中央新的代表人物，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当晚，北京的红卫兵和造反派闻风而动，连夜贴出大标语、大字报，散传单。北京医学院“八一八”等30多个造反组织和3000多人直奔中宣部，要求揪斗陶铸。在中南海门口集结了上万群众，“打倒资产阶级保皇派”的口号声和群众喧闹声，整整持续了一夜。

当日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杨成武等接见军事院校造反派和部队文艺工作者。江青等提出：“在军内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就是以刘志坚为首的全军文革小组。它不和军委联系，也不和中央文革联系，刘志坚不向中央文革请示，他谁也不请示……主席回来叫撤小组。他迟迟不撤。全军文革小组要改组。”（次日，刘志坚被揪斗，全军文革小组被封。）

当日 中央音乐学院、中央戏剧学院的造反派组织在工人体育馆召开“声势浩大”的揪斗彭、罗、陆、杨大会。

当日 缅甸联邦驻中国大使沙马杜瓦·信瓦瑙举行招待会，庆祝缅甸联邦独立19周年。国务院副总理陈毅、谢富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李四光、许德珩、傅作义、杨秀峰、韩念龙等应邀出席了招待会。信瓦瑙大使和陈毅副总理在招待会上讲话，热烈祝贺中缅两国人民的“胞波”友谊进一步发展。

当日 夺权后的新的《文汇报》在头版重新刊登毛泽东1957年1月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并发表《文汇报》说：解放以来，《文汇报》罪恶滔天，1957年堕落成为右派报纸；1961~1962年成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的报纸；1966年6月1日以来，又成为贯彻资反路线的报纸。并宣告对《文汇



1967年1月3日，上海《文汇报》被造反派夺权，揭开了所谓“一月风暴”的序幕。图为造反派夺权后召开庆祝大会。

报》夺权，要把它“办成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革命造反派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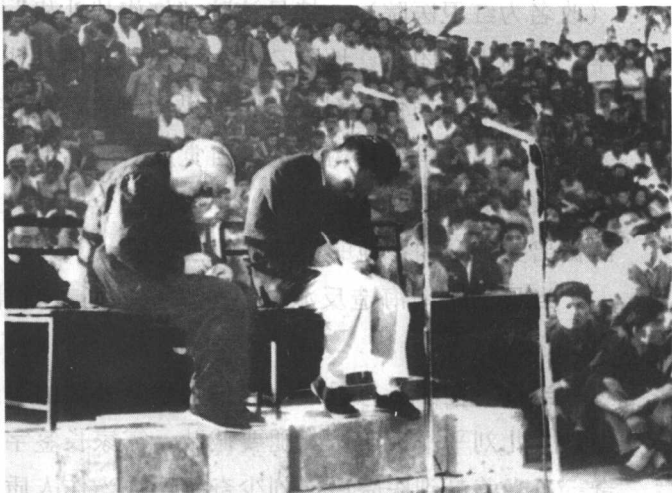
当日 新华社讯：澳门各业工人、农民、学生和其他社会团体的群众，连日来继续举行反迫害斗争大会和座谈会，愤怒谴责澳葡当局对我国方面和澳门同胞的正义要求玩弄两面手法，采取拖延耍赖的恶劣态度，指出澳葡当局一天不实现它的诺言全澳门同胞就一天不停止斗争，并揭露澳葡当局一贯包庇美蒋特务的罪行。

1月5日 新华社电：《毛主席语录》以及毛主席像章，3、4两日在澳门、香港发行，受到两地同胞热烈的欢迎。

当日 新华社电：原蒋介石集团空军少校通讯官曾朝品弃暗投明，最近由美国回到广州。1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部队空军负责人吴富善接见了曾朝品。

当日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向世界和平理事会书记处发出抗议信，对世界和平理事会书记处负责人在苏联修正主义的操纵下无理挤走中国书记一事，表示极大的愤慨和强烈的抗议，指出苏联联美反华的新阴谋必将自食恶果。

1月6日 上海市“工总司”等十几个造反组织在人民广场召开“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获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大会发出三项通令。《第一号通令》说：一、从1967年1月6日起，上海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不再承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曹获秋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和上海市市长。二、责成大会服务团在会后立即报请毛主席和党中央，罢免曹获秋党内外一切职务，并批准在上海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三、曹获秋从即日起，交给上海革命造反派监督劳动，并责令其彻底坦白交代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第二号通令》说：陈丕显必须在7天内，就如何操纵指挥曹获秋和上海市委进行反对毛主席、对抗党中央、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恶活动，向革命造反派进行彻底坦白交代。《第三号通令》提出：以陈丕显、曹获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必须彻底打倒。这次大会的发言稿和口号都经张春桥、姚文元修改审定。会上，批斗了陈丕显、曹获秋、魏文伯、杨西光等中共上海市委负责人，并把全市几百名局级以上干部揪到会场陪斗。会后，市委、市人委的所有机构被迫停止办公，全市的实际权力落到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的手中。



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和市长曹获秋在大会上接受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批判。

当日 上海《文汇报》发表题为《革命造反有理万岁》的社论。社论说，革命造反派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作出了许多所谓“越轨”行动。“越轨”就是革命，“越轨”就是造反，这些“越轨”行动是革命的创举。社论还说，如何对待“造反有理”的口号，如何对待革命造

反派，是检验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

当日 清华大学造反派扣留并批斗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

当日 陈毅副总理接见贝宁人民党总书记马鲁平、宣传书记穆西、行政书记拉策科，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1月7日 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接见被荷兰政府长期无理阻挠回国的我国出席国际焊接学会第19届年会的中国焊接学会代表团全体团员，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谈话，表示了关怀和慰问，勉励团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

当日 “封闭《广西日报》”行动委员会发表《致全区各族人民书》，号召人们：“炮轰区委！火烧韦国清！”

当日 中央文革小组王力、戚本禹来到北京精神病医院安定医院（改名为红卫医院），接见该院“红旗战斗队”队员及在该院串连的清华“井冈山兵团”、地院“东方红”、北医“八一八”红卫兵，并接见“文革”前因写信反对刘少奇而被关押在该医院的陈里宁、王福显等4人。从此，陈里宁被树立为“自觉反对刘、邓资反路线的英雄”，他的事迹被编成《新时代的狂人》小册子在全国广为流传。同时，北京造反派提出要到全国各地的精神病院去造反。

当日 中南海造反派闯进刘少奇住所，批斗刘少奇、王光美达40分钟之久。

当日 在江青怂恿下，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设下圈套，称刘少奇女儿刘平平被车压断腿要截肢，需家长签字，实际并无此事。刘少奇、王光美赶到医院后，刘少奇领回被当作人质的女儿，王光美则被揪到清华园，被迫写下四点保证。在周恩来干涉下，她才被放回。

1月8日 毛泽东在中央文革小组会上讲话。一是谈陶铸问题。他说：陶铸问题很严重，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很不老实，邓小平说还可以。十一中全会前、后，都执行了刘、邓路线。在红卫兵接见上报纸和电视照片里，有刘、邓镜头是陶铸安排的。陶铸领导的几个